

秦简公“堑洛”考^{*}

于春雷

(陕西省考古研究院, 陕西 西安市 710054)

关键词: 堑洛 长城 津关

摘要: “堑洛”不是长城,也不是水利工程,而是一项缮治津关的工程,这项工程的地理位置就在重泉城附近。

KEY WORDS: Qian-luo Great wall Fortification facilitate

ABSTRACT: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Qianluo should not be explained as the Great wall or as a drainage system project. It is better to view the term as a constructional project of a fortification facility where was adjacent to Chongquan City.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“简公六年(前409年),令吏初带剑。堑洛,城重泉。”

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秦简公六年“初令吏带剑。”秦简公七年(前408年)“堑洛,城重泉。初租禾。”

对于“堑洛”的记载只见上述两条,内容完全一样,却有时间上的误差。有研究对比《史记》叙述方式,认为以《六国年表》所记为准确^[1]。

学者对“堑洛”的研究目前都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,一方面是认为“堑洛”的本质是长城,是秦简公时期为了防御东方国家而通过铲削洛河沿岸形成的长城,该长城的作用是加强当时的秦国东部边境的防御,分布在黄龙山以南关中平原东部洛河沿岸,与渭河以南华阴的夯土长城共同将关中平原东部的缺口封堵。持这个观点的研究者也不是都有完全相同的看法,史念海认为“堑洛”长城是起于黄龙山南麓洛河西岸,大约在今陕西省白水县境内,沿洛河西岸(右岸)向南延续分布,至大荔县长城村处越过洛河到南岸(左岸),经许原(商原)西端南下在蒲城县晋城村处越过洛河到南岸(右岸),沿洛河南岸直至洛河汇入渭河处,再越过渭河,向西南经华阴市阴晋城抵华山北麓小张村一带,这条长城正好堵

塞住华山和黄龙山之间这个广大的缺口,填补关中地区自然地形的不足^[2]。彭曦则认为所谓“堑洛”长城是北至延安市黄陵县洛河西岸,沿洛河西岸直至晋城村,沿洛河前行越渭河沿华阴市长涧河西岸为夯土长城直至华山^[3]。也有学者认为是在晋城村附近直向南沿“洛渭漕渠”穿过沙苑,到达渭河^[4]。另一方面的研究则认为“堑洛”的本质并不是长城,而是一项水利工程,或者说有利于军事防御的水利工程。但是这种认识多是一些不十分确定的结论,“所以‘堑洛’当解作挖掘、疏浚洛河,削整洛河两岸陡壁,使之有利于防御,但也可能是一项水利工程。从字面看,‘堑洛’不含有修筑长城的意义。”^[5]樊志民也认为“其本意虽在于军事目的,但在某种程度上亦有改善局部农业生产景观之效。”^[6]而史党社在认真阅读前人研究并实地调查之后谨慎地认为“‘堑洛’很可能是利用洛河天然河道驻军,进行防守的一种方法,与堑河旁、堑河濒同例,仅仅是在洛河的某些地方把河道加深而已,而不是在地上另筑长城,当然在某些要害部位筑城或要塞——如重泉,则是可以的,但却不是长城。……若说‘堑洛’为长城遗址,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。”^[7]

以上研究或认为“堑洛”是长城,或认为是

^{*} 本文是2010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第07号招标课题《中国历代长城研究》(项目批准号10JZD0007)阶段成果。

一项水利工程,这些研究都认为秦魏两国是以洛河为界的,当时秦简公确实曾经洛河沿岸进行过铲削挖掘的工程,史党社的调查并没有发现“堑洛”的痕迹或遗迹,研究则认为这项工程可能仅仅是在洛河的局部段落进行过。

在进行陕西省长城资源调查时,2009年~2010年,笔者曾就“堑洛”做过调查,也对上述研究涉及到的地方和遗址进行了调查,并对有关“堑洛”的记载和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,认为“堑洛”不是长城,也不是农业水利工程,只是秦国当时谨守严格津关之类的举措,所涉及的洛河段落是在可以渡河成为津关之处。论述如下:

一、“堑洛”非长城

长城,不管是何种形态的长城,都是处于静态的一方用于防御处于动态的一方的军事工事。在秦简公时,秦魏两国基本是在河西地区进行征战,先是在少梁一带争夺,继而是秦国修建重泉城,魏国修建雒阴和合阳。这段时间内秦国大部分情况下是处于守势,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河西地区逐渐被魏国夺走^[1]。也有研究指出,此时秦简公在河西受到的威胁不仅是来自魏国的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来自公子连(秦灵公之子秦献公)的威胁^[2]。

当时秦魏两国在河西地区来回争夺,但大体上是秦国以退守为主,而魏国则以进取为主。可是纵览战国一代,魏国并没有在黄龙山以南越过洛河向西进取,华山以北没有越过郑向西^[3]。可见洛河与郑所之塞在当时是秦国与东方国家在黄龙山以南、华山以北的主要分界线。从秦魏两国的形势看,当时秦国确实有必要在洛河一线布防,但是是否需要修筑长城,却另当别论。

洛河从白于山发源,沿子午岭东侧南流,一直在陕北高原上流淌,出黄龙山后在白水县进入关中平原,南流至大荔县铁镰山(商原西端),绕过铁镰山后,沿沙苑北侧东流折向南进入渭河,或认为在当时是直接汇入黄河^[4]。

在洛河流经的区域都是黄土层很厚的黄土高原,洛河将黄土冲刷切割,形成的洛河河道在洛川县与黄陵县之间段已经下切到岩石层,都是数十米高的壁立陡岸,到现在都少有道路横向穿

越,更没有沿河的道路;在出黄龙山后,进入关中平原的黄土黄土塬区流淌,由于该区的黄土直立性普遍较好,在白水、蒲城和澄城、大荔之间段河道两岸都是数十米高的黄土悬崖,或者由于洛河大溜左右摆动,河水侧蚀导致该段河岸有的部分左岸壁立,右岸稍缓,或右岸壁立而左岸稍缓。但就在稍缓的一侧也是由于雨水的冲刷而沟壑遍布,能够在该段横越洛河交通左右的地方是有限的。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如此,当时的洛河河道只能比现在更加陡峭。所以,秦国不会沿洛河大量施工修筑所谓的长城。

在铁镰山以南沙苑地区,该段洛河河道较浅,流速也低,渡河而过是比较方便的。但是洛河和渭河之间的沙苑却又是一道屏障,今天的沙苑东西宽达80里,南北长达30里。在历史时期以前,沙苑一带古河道很多,形成网状水系分布,河流经常改道,有牛轭湖分布其间,沙苑的细石器文化证明该地是以渔猎为主的经济形式,洛河河道最初经沙苑西侧南流入渭河,后来经沙苑东部南流入渭河。在秦简公时代,洛河河道基本定型成现代的样子,但是沙苑地区也是河湖广布,到北魏时已有沙苑之名^[5]。洛河河道是否在秦简公时定型姑且不论,以河伯冯夷(传说为华阴潼乡人)所居阳华(或作阳奠、阳湾)之渊的传说看,应该渭河、洛河、黄河交汇之地是水势浩淼,推测当时的沙苑之地应该是沼泽地带,曾是大荔戎人所居之地,尤其不适合当时晋国战车驰突,沙苑本身就是很难逾越的地方,秦国不必在此费心筑城防守。

所以,秦国不必沿洛河布防,也不必穿越沙苑,修一道壕堑。

以上所述可知,秦简公“堑洛”不是修筑长城。

二、“堑洛”不是农业水利工程

洛河流经的关中平原向被称为“沃野千里,天府之国”,《禹贡》将雍州定位为“其土黄壤。田上上,赋中下”^[6]。又是宗周所在,为当时最好的农业生产地区之一。

但是在关中比较大型的、值得载入史册的水利工程最早却是郑国渠,还是郑国欲以此疲秦,

以此知秦国当时是没有好的水工的。洛河所流经的地方在铁镰山以北是高岸深谷,铁镰山以南是沙苑,都是难以进行水利工程施工的。有史可征的在洛河上修建的水利工程最早的是西汉的龙首渠,在洛河东岸修凿,但结果是“作之十余年,渠颇通,犹未得其饶”^[14]。北周保定二年(562),又曾在今大荔开龙首渠以利灌溉^[15]。至唐代,著名水利家姜师度在这一带重新兴建灌溉工程,“于朝邑、河西二县界,就古通灵陂,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,以种稻田,凡两千余顷,内置屯十余所,收获万计。”^[16]此后引洛灌溉相沿不断,民国时期杨虎城和李仪祉曾重修龙首坝和洛惠渠。但是这些水利工程都是集中在洛河以东,只有现代的洛惠渠才能惠及洛西。

以上所述可知,在秦简公时代是沒能力在洛河修建惠及洛河西岸的水利工程的。至于樊志民所述“具体就堑河、堑洛工程而言,由于削陡、增高河岸,使土安其处不再流失;由于掘深、拓宽河道,使水归其壑难以为害。据此以言堑河、堑洛工程‘在某种程度上亦有改善局部农业生产景观之效’,当不为过。”^[17]专业所限,不敢妄言。但认为“堑洛”可使洛河“掘深、拓宽河道,使水归其壑难以为害”则稍显将堑洛工程想的太大。

洛河所流经的地方在铁镰山以上,河道都较深,也不存在发生水患的可能,就是详查史籍也只有周幽王二年“三川竭,岐山崩”^[18]的记载,再无发生水患的记载。至于铁镰山以下沙苑段,本来就是沼泽之地,洛河改道之处,但是在沙苑地区积沙厚达10余米,最厚处达40余米^[19]。在沙苑西南部,发现有秦汉时代的文化层,位于现在地层以下约1.5米处,两千年来的堆积层只有1.5米厚,以这种堆积速度估计,秦简公时的地面最多位于现在地面以下2米处,那么当时的积沙厚度最低也达8米左右,显然这里是不能进行堑的工程;而对于这种地方,也是无法进行水利工程施工的;即使疏浚洛河,也是不可想象的。

可知,“堑洛”也不是农田水利工程。

三、“堑洛”为缮治津关的举措

“堑洛”两次出现在《史记》中,应该是确有其事。同时还有“堑河旁。以兵二万伐大荔,取

其王城。”^[20]“城堑河濒”^[21],可知“堑”,尤其是针对河流的“堑”,在当时是一项很重要的工程。以此确定“堑洛”不是司马迁误记。

现在已经无从看见“堑洛”的痕迹了,但重泉还是有遗迹可循的,在今陕西省蒲城县晋城村南^[22]。根据每每“城”“堑”对举^[23],可能这是相互配套的工程。

调查发现,枯水期在重泉附近是可以徒涉越过洛河来往的,丰水期该处应该有船渡河,虽然今天已不见渡船,但晋城村东南隔河的船舍村应该就是这种情况的遗留。而日后以洛河通漕运,可能也会在此设有停留之处。以此可知该地一直是一处洛河渡口所在,在秦简公时代还是在秦魏两国边境线上的一处渡口,这就可以理解修建重泉城的意义和目的了,就是要控制这个渡口。

调查过程中,在洛河东岸商原西端还发现有两处战国时期建筑遗迹,第一处位于东高垣村和北郭村之间,所处位置是铁镰山最高处,位于大荔县“长城”西约500米处,该处有较多的绳纹瓦片和连续的夯土基址,埋藏较深,上距地表1米。瓦片纹饰与魏长城沿线所采集的瓦片纹饰相同,都是外饰绳纹,内饰布纹,夯层厚度为0.06米~0.09米,大荔县“长城”的夯层厚度为0.05米~0.09米;第二处位于第一处以南约1700米处稍偏东,该处有较多的绳纹瓦片散落地表。这两处遗址均为建筑遗址无疑,但对其性质尚未明确。

就在秦简公城重泉的同一年,魏文侯十七年(前408)“西攻秦,至郑而还,筑雒阴、合阳”^[24]。对于雒阴城的位置,《史记》正义引《括地志》认为“雒阴在同州西”,《读史方輿记要》认为“雒阴在州西北”,王重九撰文认为以上所说有误^[25],史念海曾做过研究,最后认为在商原西端洛河西流段南岸,并认为《括地志》与《读史方輿记要》所记不应否定^[26]。

调查所发现的这两处遗址,尤其是第一处遗址,正符合“同州西”“州西北”和洛河之阴等条件,有可能就是雒阴城的建筑遗址。即使不是雒阴城,也必然是一处重要的建筑,目的就是针对秦国的重泉城进行设防。

此处要渡过洛河,交通秦魏两国,自然也是所谓的津关。古代政府很重视交通津关的管理设置,汉初还有专门的《津关令》^[27],《津关令》

中列举的“扞关、郾关、函谷、武关及诸河塞津关”，该处应该就是“诸河塞津关”之一。

重泉城意在控制此处渡口，当然要将渡河之处设置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，像今天道路上的路卡或收费站。就需要将附近其他可以下到河滩的河岸进行铲削，使得秦国方面渡河只能从一个固定的线路通过，也使得魏国方面渡河上岸的地方极其有限，且便于防守。“堑洛”正是这一工程的称呼，正是对这一渡口的修整，是当时缮治津关的一项举措。

贾谊《过秦论》中说秦国“缮津关，据险塞，修甲兵而守之。”杜笃《论都赋》说到关中形势也说“杜口绝津，朔方无从”。始建国二年（10）十二月，王莽下令“吏民出入，持布钱以副符传，不持者，厨传勿舍，关津苛留。”^[2]可知津关职责重大，事关国家安危，所以司马迁才不厌其烦地将“堑河旁”“城堑河濒”“堑洛”这些缮治边疆津关的举措一一记下。

四、元里渡口

沿洛河一线，不仅只有重泉一处津关。秦魏之间洛河上的渡口应该还有元里，秦堑洛之前，魏国修建了临晋和元里^[2]，元里位于今陕西省澄城县交道镇附近^[3]，今天仍然有元里村。在元里向西越过洛河，就是蒲城西头村，在该村曾发现汉代澠邑漕仓遗址^[4]。说明该处也是一处交通孔道。

魏惠王十七年（前354），秦魏在元里发生战争^[2]，应该就是秦国从西头村一带渡河，前往攻打元里。秦国在这个渡口也应该建有相应的城，在澠邑漕仓遗址上有一处陶窑遗址，发现了大量外饰绳纹的瓦片，内饰以麻点纹和菱格纹为主，有少量的布纹；还发现了灰陶片，外部纹饰以细绳纹或网纹为主，有少量为素面；另外还发现有关中少见的弦纹瓦当。根据所见瓦片及陶片纹饰看，该遗址时代应该是春秋至西汉^[3]。而“汉代澠邑漕仓遗址”的定时、定名与定性是依据现场采集的四块文字瓦当^[4]，对于汉代以前该地是否也是漕仓，尤其是秦简公时代，则需要重新考虑。洛河作为秦魏两国界线，征战时代绝不可能作为漕仓使用。推测在秦简公时代，或者说秦

魏以洛河为界的时代，该地不是漕仓，那当时的建筑必然就是与重泉性质相同的城址。

秦简公“堑洛”对该处的渡口有没有进行缮治，史书没有记载。但依据秦孝公八年（前354）秦魏在元里打仗，秦国取得少梁的情况看，元里渡口是前往少梁的咽喉。而秦灵公时代（前424～前412）秦魏两国屡在少梁一带征战，甚至早在春秋时代，秦晋两国就经常在河西北部互相征战^[3]，可以认为当时这个渡口已经被频繁使用了。所以“堑”和“城”的工程应该早就进行了，但也不排除此次同时对元里渡口进行修缮的可能。

另外，在前人研究中有人认为“堑洛”可以使洛河河道加深，河岸加高，疏浚洛河，铲削洛河两岸，根据秦魏当时的形势看，首先不可能是铲削洛河两岸，而是只在洛河西岸施工；其次这并不是疏浚河道，并不会使河道加深，只是将渡口附近其他平缓可以通人马的河岸加以铲削，留下一处渡口通过。

综上所述，“堑洛”是一项缮治津关的工程，而不是修筑长城，也与农田水利无关。

[1] 阮燕，叶万松。“上郡塞”与“堑洛”长城辨 [J]. 考古与文物，1997（2）. 时间上的误差并不影响本文的论述。

[2] 史念海. 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[C] // 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. 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1.

[3] 彭曦. 秦简公“堑洛”遗迹考察简报 [J]. 文物，1996（4）.

[4] a. 中国文物地图集（陕西分册）（下册）[M]. 西安：西安地图出版社，1998：521. “渭南市·蒲城县·洛渭漕渠遗址蒲城段”. b. 史念海. 再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 [J].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，1985（2）.

[5] 同注 [1].

[6] a. 樊志民. 秦农业历史研究 [M]. 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1997：9. b. 刘景纯. 也说“堑河”“堑洛”的功效问题 [J].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，2000（1）. c. 樊志民. 堑河、堑洛功效宜作多维观 [J].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，2000（3）.

[7] 史党社. 陕西渭南地区的秦魏长城及城址考察 [C] // 秦文化论丛（第5辑）. 西安：西北大学出版社，1995.

[8] 司马迁. 史记 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：200. “秦以往者数易君，君臣乖乱，故晋复疆，夺秦河西地。”

[9] 聂新民，聂莉. 秦简公堑洛及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 [C] // 秦文化论丛（第11辑）. 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4.

[10] 同注 [8]：196，197. 春秋时期，晋国曾经有两次越过洛河向西，但都是临时征战，不能占有其地。一次是秦桓公二十六年（前578）“晋率诸侯伐秦，秦军败走，追至泾而还。”第二

次是秦景公十八年(前 559)“晋悼公彊,数会诸侯,率以伐秦,败秦军。秦军走,晋兵追之,遂渡泾,至殽林而还。”

- [1] 同注 [4] b.
- [2] 王元林. 沙苑的历史变迁 [J]. 人文杂志, 2001(4).
- [3] 同注 [8]: 64.
- [4] 同注 [8]: 1412.
- [5] 令狐德棻. 周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1: 66. “二年春正月壬寅, 初于蒲州开河渠, 同州开龙首渠, 以广灌溉。”
- [6] 刘昫. 旧唐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5: 4816.
- [7] 同注 [4] c.
- [8] 同注 [8]: 146.
- [9] 同注 [4] b.
- [10] 同注 [8]: 199.
- [11] 同注 [8]: 705.
- [12] a. 同注 [8]: 200. “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县东南四十五里也。” b. 同注 [4] a: 521. “蒲城县”有“重泉故城”条。调查在晋城村及以南的铃钊村发现大量的建筑遗存, 包括绳纹瓦片和夯土遗迹。
- [13] “堑洛”与“城重泉”对举, “堑河”与“取大荔王城”对举, “堑河濒”与“城”对举。秦灵公六年(前 419), 晋城少梁, 秦击之; 秦灵公七年(前 418), 与魏战少梁; 秦灵公八年(前 417), 魏复城少梁, 秦城堑河濒; 秦灵公十年(前 415) 秦补庞城, 城籍姑。以此推断, “城堑河濒”应该在少梁、庞一带, 就是今天陕西韩城市南部和合阳县东北部一带, 所城之地, 或者为少梁, 或者为庞 “堑河”应该就是针对临晋关进行

的工程。史党社先生在《陕西渭南地区的秦魏长城及城址考察》一文中也注意到“城”“堑”并举的现象。

- [14] 同注 [8]: 1838.
- [15] 王重九. 关中东秦魏诸长城遗迹的再探索 [J] // 历史地理(第 5 辑)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7.
- [16] 同注 [4] b.
- [17] 张家山汉墓竹简(二四七号墓)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06: 83.
- [18] 班固. 汉书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. 1962: 4122.
- [19] 同注 [8]: 1838. 魏文侯十六年(前 409) 伐秦, 筑临晋元里。
- [20] 谭其骧. 中国历史地图集(第一册) [M]. 北京: 中国地图出版社, 1982: 35—36.
- [21] 赵可, 刘珠明. 蒲城县发现汉激邑漕仓遗址 [J]. 考古与文物, 1994(4).
- [22] 同注 [8]: 1845. 魏惠王十七年(前 354) “与秦战元里, 秦取我少梁。”
- [23] 彭曦. 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 [J]. 文博, 1994(1).
- [24] 同注 [11].
- [25] 杨伯俊编著. 春秋左传注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0: 575. 鲁文公十年(前 618) “春, 晋人伐秦, 取少梁。夏, 秦伯伐晋, 取北徵。”

(责任编辑 谭青枝)

(上接 54 页)

- [1] 朱红林. 《周礼》中商业管理制度研究 [M].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3: 39.
- [2] 同 [1].
- [3] a. 同 [5]. b. 徐畅. 先秦玺印图说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09: 216.
- [4] 宋镇豪. 中国古代“集中市制”及有关方面的考察 [J]. 文物, 1990(1).
- [5] 韩伟等. 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 [J]. 考古与文物, 1988(5, 6).
- [6] 刘庆柱. 西安市汉长安城东市和西市遗址 [J] // 中国考古学会编. 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7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1988: 264.
- [7] 曲英杰. 先秦都城复原研究 [M]. 哈尔滨: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1990: 282.
- [8] 同 [7]: 389.
- [9] 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. 纪南城松柏鱼池探掘简报 [J]. 江汉考古, 1987(3).
- [10] 据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. 晋都新田 [M].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1996: 99 图.
- [11] 据邯郸市文物保管所. 河北邯郸市市区古遗址调查简报 [J]. 考古, 1980(2).

- [12] 段宏振. 赵都邯郸城研究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09: 92—108.
- [13] 陈光唐. 邯郸历史与考古 [M]. 台北: 文津出版社, 1991: 78.
- [14] 贺业钜.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 [M]. 北京: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, 1996: 275.
- [15] 同 [14].
- [16] a. 相关考古资料分别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. 燕下都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1996. b.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.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——1975—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05.
- [17] 据河北省文物研究所. 燕下都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1996: 图二.
- [18] 采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.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——1975—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05: 插图二.
- [19]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. 战国中山国灵寿城——1975—1993 年考古发掘报告 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05: 20—22.

(责任编辑 李自智)